

民间化,组织化,社会化 ——中国科普事业的光明之路

China's Cause of Popular Science: Popularization, Organization and Socialization

吴向红

(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,博士生 北京 100872)

去年12月5日发布的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》,在知识界激起了一片欢呼之声。然而,尽管欢呼声很大,但却未看到各方面现实的有效行动。科技期刊、科普期刊订数依旧徘徊,高水平的科普作品依旧凤毛麟角,猎奇、神秘乃至欺诈性的刊物书籍仍充斥街头,乃至在中央级的严肃大报上仍能读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所谓“科技珍闻”。看来有必要反思:依靠政治权威来推动科学普及事业,反对形形色色的反科学、伪科学活动,究竟是不是一条最佳途径?

科普事业要靠科学自身的权威来推动

无疑,在任何社会中,科学技术事业都应最大限度地争取政治上的支持。特别在中国,假若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,开展全民性科普工作是不可想象的。但是有必要记住,政治权威与科学权威不可等同,古今皆然。这是由二者的本质所决定的。

科学是一桩理性的事业,更是一桩实证的事业。在任何时候,科学都把是否符合客观事实作为最高的标准。科学只承认那些合乎逻辑,并且被经验事实所验证了的命题,由于科学的目标是追求真理,因此它要求每个从事科学的人必须以真诚的态度、中立的立场和开放的姿态来行动。科学因此具有道德完美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。

政治却以实际的操作目标为目的。政治不仅需要客观、冷静、理性的头脑,更需要在关键时刻审慎独断乃至破釜沉舟的气魄。对于暂时不能解答的问题,科学可以将其搁置,政治却无法回避,因为每一分钟的犹豫都可能意味着更大的损失。最后,政治不可能是世界主义的,乃至也不可能是全民主义的,它只代表特定利益,或者是某些特定利益的折衷。因此,政治运作不可能是完全透明的和诚实的,政治上的道德完美主义乃是一种幼稚的观念。

科学和政治,两者各有其权威。把一方的权威引入另一方的努力往往结果不妙。试图让科学权威去仲裁政治,就是政治上的“唯科学主义”或“专家治国论”。由于科学权威是明确的、唯一的,真理只有一个,因此任何含糊其辞、妥协折衷都将被排除在外。无疑,这将导致政治运作变得更加严酷,无法求大同存小异,更谈不上对立观点之间的妥协合作。在某种意义上,计划经济可以看作是一种使政治运作“科学化”的尝试。虽然这是个经济领域内的问题,但计划经济的实行者也是政治权力的拥有者。对整个社会进行明确的、不容动摇的、“科学”的计划和管制,其严重后果已是众目所睹的了。而向市场经济转变,正意味着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不同的利益主体,为他们留下更大的政治空间。

把政治权威引入科学,也决不是一桩幸事。科学权威原则上是非个人化的,即不以个人的年龄、魅力、社交能力、群众支持程度为依据,只以非个人化的真理性理论为权威。相对论如果不是爱因斯坦,而是弗洛依德创立的,也无损于其权威性;相反,爱因斯坦的错误非权威者皆可据理纠正。而政治权威是个人化的,他的错误则必须由他本人或其他政治权威来纠正。事实上,我国的科学事业曾长期受政治权威之害,50、60年代的旧事就不必重提了,80年代以来,仍有以个人的权威取代理论的权威的迹象。但是任何一位科学家(包括权威科学家)所提出的观点都应经受科学实验和客观实践的验证。其中的错误会受到公开、平等的质疑和纠正。

科学权威的建立过程也不同于政治权威,它不是凭藉某种社会化的仪式,如一次选举、一纸任命、一场授勋来获得的,而是凭藉理性劝服的力量,慢慢积累起来的。容忍、尊敬别人的观点,乐于倾听,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,这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。如果背离这一精神,即使是为了“正确的”目的,也是极为危险的,迟早会伤害科学事业自身。

因此,从根本上讲,科学反对愚昧的这场战争,不能指望借助政治权威的力量来取得真正的胜利。在政治权威面前,不同的观点也许会暂时消声匿迹,内心深处的问题不会解决。在这场战争中,科学一方要避免教条主义、自卫心理和道德义愤,必须通过耐心的、无可争辩的论证和演示,来达到自己的目标。科普工作的出路在于民间化,切忌借助任何权威摆出一副唯我才是真理的官腔官调。

美国人的经验

在美国,70年代是形形色色的反科学、伪科学最为泛滥的时期,原教旨主义、外星人、占星术等都十分风行。一些严肃的学者深忧于此种局面,但是他们并没有呼吁国会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占星术之类,而是组织了一个团体——“科学调查超常观点委员会(The Committee for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Claims of the Paranormal,简称CSICOP)。这是一次富有革命意义的行动。如果说科普工作只有走向民间化才能深入,那么它必须达到组织化,才能有足够的力量推进自己的事业。

CSICOP于1976年5月1日在纽约州立大学成立,其成员包括心理学家、心理病学家、物理学家、生理学家、天体物理学家、认知科学家、空间科学家、数学家、天文学家、医学家等科学工作者,包括统计学家、工程师、宇航员等技术工作者,包括哲学家、人类学家、社会学家等社会科学工作者,包括科学编辑、魔术师、作家、科学撰稿人、律师、电影制片人等各行各业的有识之士。它并不把科普视为科学家的专利,并不认为只有专业科学家才配为科学而战,而是致力于推动一项社会化的事业。

CSICOP自成立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。1976年秋天起,它开始推出会刊《质疑者》(Skeptical Inquirer),无情地揭露、嘲弄那些伪科学、反科学活动,细致地实地调查每一案例并公诸于众。《质疑者》一开始半年才出一期,从1978年秋天起改为季刊,每期也从80页增到96页,后又增为112页。80年代初其订数突破1万,此后稳步上升,到1994年已达到35000份。从1995年起《质疑者》改为双月刊,开本扩大,呈现出良好的势头。

CSICOP的出现有效地打击了伪科学、反科学的势头,也深深地刺痛了某些人。1992年,所谓的特异功能大师尤里·盖勒几乎同时向该协会提出了三桩控告,企图靠打官司把CSICOP拖入旷日持久的法律程序,从经济上拖垮它。到1992年夏天为了必要的法律费用,CSICOP已花费10万美元,不得不向社会各界吁请支援,结果得到了大量捐助。事实上,CSICOP的事业目前已相当壮大,他们向社会各界募捐修建自己的办公楼和图书馆,预算400万

美元,目前所得捐款已达到300多万美元。

CSICOP关注中国的情况,曾派出一个6人小组来中国,悬赏1万美元以待特异功能“大师”,结果所有应战的“大师”均表演失败。今年4月,CSICOP还拟派一个3人小组来华。

我从1991年起与CSICOP保持联系。我感到他们的经验表明,民间化、社会化、组织化不仅是科普工作应该选择的道路,而且是一条光明之路。

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

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敏于言而讷于行的传统,长于呼吁谏请而拙于行动。即使在言论方面,中国士大夫传统也是主张“不言之辩”、“不争之论”的。春秋时期公孙龙擅辩,大知识分子孔穿就说“辞胜不如理胜”,总之相信真理是在我这边,我何必与你逞口舌之利呢?

这种心态似乎也存在于今天的一些知识分子中。不少人对街头泛滥的奇谈怪论不屑一顾,抱一种“见怪不怪,其怪自败”的态度。认为正统科学的地位稳于磐石,从中央到地方都承认“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”,何必去同那些连第八、第九生产力都算不上的耸人之论较真呢?

然而事实上,今天社会上已明显地形成了一股不利于科学的舆论,特别是社会风气中对科学精神的贬斥。即使在知识分子中,也并非没有反映。例如有人认为“五四”时期“科学与民主”的口号是“唯科学主义”,甚至由此得出其导致了极权政治的结论。应该承认,这一类观点不是毫无见地的,但正如笔者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到的,中国的所谓“唯科学主义”并未形成明确的传统,更没有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。中国的现实问题倒是科学精神的匮乏。

否定“五四”的“科学与民主”的口号是一个危险的信号,提醒一切还具有科学精神的知识分子,不能再高枕无忧下去。另一方面,一些“为科学而战”的知识分子又有陷入教条主义、自卫心理和道德义愤的倾向,试图一棍子把对立面打死,试图像“扫黄打非”那样把伪科学反科学的东西统统清扫出去。这种激愤行动同样损害着科学精神的内核,其结果有时适得其反。科学越是气势汹汹,越是摆出一副不容争辩的面孔去教训社会公众,越是居高临下地说“我这儿出来的才是真科学,他们那儿贩卖的全是地摊货”,反而越容易招致大众的反感、疏远和敬而远之。与此同时,那些摆出一副平等姿态和热心肠面孔的反科学、伪科学就更容易借“为你咨询人生”、“帮你度过迷津”、“提供你生活中的科学常识”之类诱惑人的词藻,博得大众的同情和信任,渐渐地占据大众舆论阵地。

(下转第5页)

型;其三是以日、法、德及多数发展中国家所广为采用的集中协调型。不同模式相应于不同的国家状况与条件,并不存在一个不依存于一定条件下的超然理想模式。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几乎炸平了的德、日两国并未采用美国的科技体制,却在半个世纪之内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发展,某些方面还大大超越美国。前苏联的科技体制相对于本国而言,也不能说一无是处。俄罗斯具有与美国航天站在太空对接的科技实力,就证明了所用的科技体制的有效性。至于他们现存的种种问题,源自于前苏联的政治、经济等多种因素,不能完全归咎于科技体制的优劣。如果说各国科技体制设置存有共同之点的话,就在于立足国情以相对于本国战略目标功能最优为原则,构筑科技结构模式。小平同志早已提出了“特色理论”,并被我国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效果证明是科学的。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,理所当然地应当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,立足我国实情,构筑具有中国特色的科技体制。除此之外,别无它途。

六、合理运用竞争机制与指令性计划的作用,建立符合国家战略导向的科技投入机制

为促进科技经济的有机结构,加速科技成果转化,推动我国战略目标的实现,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育的条件下,无论由市场导向属于“放开一片”的科技领域,还是由计划调控属“稳住一头”的研究部门,都应依据相同的科技、经济的运行规律,建立相应的竞争机制。通过竞争,择优扶持,择优强化,合理配置资源,提高科技效益。这是讲求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的实效,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坚实基础。但是竞争机制的导向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战略导向。例如,我国东、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日益

拉大,解决东西部经济均衡发展问题已成为国家的战略任务,事关重大。为此对资源丰富、地域广阔,但经济基础薄弱、科技实力不足的内陆、边远地区急需加大科技投入,增强科技实力,以科技为先导,加速内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。现有的竞争机制却只能引导西部科技力量的东移,加剧贫困地区科技基础的消弱。对此,只能运用国家的指令性手段,发挥倾斜性政策的调控作用,否则后果堪忧。

另外,基础科学研究、高新技术创新的重大突破不能凭空而来,需要有完备的设备系统、高水平的技术支持条件和适宜创新的学术思想、学术气氛。这些是要依靠数代人的艰辛劳动、不断积累才能形成的。因此科研基地的建设非常必要。在竞争机制中,科技人员要竞争、流动,科研领域、方向要论证、更新,但基地布局要相对稳定、投资要相对集中;这也是不能完全由竞争机制所能解决的问题。

各科技实体、各行业、各部门的效益虽是体现国家战略导向的基础,但并不能等效于国家的战略利益,个人、集体、国家三者间的矛盾在科技界同样存在的。对此,竞争机制要设计有利于打破部门界线,打破行业壁垒的政策,引导联合、协作,形成引导科技界为追求超越部门利益而竞争的态势。总之,科技投入的机制设计,要按市场导向与科技导向相结合,竞争机制与计划指令相结合,放活科技部门与促进联合协作、做到整体有序相结合,形成最有利于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调控手段。

以上仅提及有关影响科技体制改革实效的方向、目标、任务及调整的协调性、建立机制的完备性等基本问题。由此推演还有诸如社会环境的分析与对策、“稳住一头”和“放开一片”的实施对策、建立有效的科技管理体系等一系列问题。本文旨在抛砖引玉,在此就不再尽述了。(责任编辑 蔡德诚)

(上接第 10 页)

还有一些人在批驳那些奇谈怪论时,自己却是从本本出发,高谈阔论,一口一个“不可能”,“据权威人士说”,拒绝实证地考察。这种行为并不是科学的。也正是这一点给伪科学的传播者们留下了空子。某些有关特异功能的专著中,列举了许多证明其“特异现象存在”的“事例”,如果不对其中至少最典型的一些案例作实证考察,怎么能对其“理论”作出有说服力的批驳呢?

中国知识界应该借鉴国外类似 CSICOP 这样组织的成功经验,结合自己的实际国情,走民间化、组织化、社会化的路子,才有利于使科普事业摆脱上述种种不良倾向,走向辉煌。

笔者相信,在中国科技界乃至知识界,一定有

一大批坚持科学精神,富于行动意识,恪守实事求是态度和以理服人原则的知识分子。这是一支潜在的巨大力量。关键在于联合起来,组织起来,共创中国科普事业的未来。我们需要开展一场新的运动。这场运动必须不是以社会公众为“运动对象”,而是吸引他们成为“主体”。事实上,社会公众和科技界一样,正成为假冒科学的受害者。许多企业被科技骗子骗走了上百万、上千万元的巨资。至于那些满天飞的“科技产品”、“致富信息”,更使每个消费者和劳动者都成为潜在的受害对象。这样广泛的社会力量必将成为我们的同盟军,我们有理由期待企业和大众传媒的合作与支持,我们同样期待所有社会成员的支持。(责任编辑 蔡德诚)